

蔡雪村著

中國歷史上的

農民戰爭

一 唐代國內市場繁榮與國際貿易的勃興

黃巢暴動發生於唐代的末期。這次由黃巢所領導的農民暴動不單動搖了唐朝的政權，並且引起了世界各國的注意。黃巢暴動的物質背景是一種自然經濟社會內的農奴反抗封建領主呢？抑是商業經濟支配的土地制度之下的必然結果？黃巢暴動的對象是簡單的所謂封建的地主呢？還是商業資本家化的地主及一切剝削農民的商業資本勢力？爲要答復這些問題，必須首先研究唐朝的一般經濟狀況。當在黃巢暴動之前唐朝的商業資本是附屬於地主經濟而發展呢？還是商業資本蓬勃的發展而支

配了農村經濟。關於由秦漢以至唐代的商業資本本身並非從天而降，而是隨着各時期的生產關係向前發展着，這種情形已經成了東西各國古代社會歷史上的事實。商業資本利用手工業的生產品統治了農村，反轉來又用媒介及資本的關係奴役了手工業生產者。由於分工交換形成了商人階級，由於商業資本的活動更加推動了商品生產的進步與發展。我們知道唐代的各種生產品隨着商業發達而得到了很大的進步。茶葉的出產可以說自唐而始正式的走進了國內市場，並且很快的又成了輸出國外的主要商品之一。瓷器亦在唐代開始促進了精密分工的製造。

「唐初浮梁之昌南鎮有陶氏者，善爲瓷器，高祖時載以入關，貢於朝。」（文獻

通考）

這種可以買上的瓷器就是後來德國地理學家黎薛太可峯贊賞中國瓷器分工精密技術高妙之創始。至於一般的製造品也有異乎以往各時代之驚人的進步。

（舊唐書李

暉傳有一段說：

『常運心巧思，爲戰艦，挾二輪踏之，翔風鼓浪，疾若掛帆席。』

據此則當時水上交通工具亦必有一番進步的改革。這種原始粗陋輪船式的帆船之發明，對於唐代商業發展上有極大的幫助。手工業生產品的生產方法既如上述的改良，當然出產的商品亦必益加精良與繁夥，客觀上必然更加促進了商業資本在國內外市場上的暢旺。關於唐代商業繁榮的情況，擇其要者述之於左：

(一) 唐代國內市場的興盛與統一已非往昔各朝可比。京師設市分官，專管中外通商之事，一切商品必先於市建標，然後陳列各種商品於市，用稱與斗二物平市，以上中下之三價均市。凡物必須仿照官所製造之標準而爲之，並須題製造人之姓名於其商品之上，然後方許販賣；否則，僞濫者官必沒收，不中選者仍退歸原主。這些辦法，一則爲統一全國市場度量衡之法則，再則爲均準天下貨物之品質，與現今商人向政府『註冊商標』的意義大略相同。這種整齊劃一規模宏大的市場決非商業初期發展的互市之地所可比擬，完全是商業發展到很高程度的現象。

武后長安二年鳳閣舍人崔融

的奏摺上描寫當時商業繁榮狀況說：

『……且如天下諸津，舟行所聚，洪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貨往還，昧旦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纔過，彼鋪復止，非唯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徼賂，何則，關爲詰暴之所，市爲聚人之地……』（文獻通考）

至德宗時，又從趙贊之議，諸道津會置吏專管稅關之事。商賈交之錢每緡，政府抽稅二十，竹木茶漆抽收十分之一。考關市邸店抽稅之制，由來已久，而江津河口設置稅卡，恐怕只有從唐代始開創。唐代由武后至德宗時代所創設的水上稅關一事，可以暗示出兩種意義：一則表示出當時商業興盛已普遍各地，再則證明水上運輸成了唐代市場繁榮的一大因素。那些竹木茶漆的大宗出產品只有『洪舸巨艦』轉運，方能滿足市場上之慾望。

隨着商業資本發展而發生的要求，擴大國內市場及征服四邊的弱小民族使其成爲本國的商業殖民地，亦屬商業資本發展過程中必然要有的事。唐朝向外發展及各

民族被征服的事蹟及列於左：

國名今地年	代西曆結	果
東突厥 外蒙	太宗貞觀四 年	六三〇年 分其地爲十州設定襄 雲中二都督府
高昌 新疆吐 魯番縣	貞觀十四年 六四〇年	以其地爲西州設安西 都護府
吐蕃 西藏	貞觀十五年 六四一年	和親
鐵勒 外蒙	貞觀二十年 六四六年	分其部落爲六都督府 七州置燕然都護府
龜茲 新疆庫 車縣	貞觀二十二年 六四八年	以其地爲龜茲都督府 徙安西都護府於此
印度 印度	貞觀二十二年 六四八年	

昭武九姓		中亞		高宗永徽時		代 西曆一五五年		以其部落分爲府州	
西突厥		中亞		顯慶二		年 六五七年		分其地爲崑陵濛池二 都護府	
吐火羅		阿母河 流域		顯慶二		年 六五七年		以其都阿綏城爲月氏 都督府	
百濟		朝鮮西 南部		顯慶五		年 六六〇年		分其地爲五都督府設 熊津都督府於其都	
吐谷渾		青海		龍朔三		年 六六三年		徙其部落於靈州設安 樂州以鎮之	
黨項		青海東南		龍朔以 後		年 六六八年		以其地設置府州 分其地爲九都督府罕三	
高麗		朝鮮之北		總章元		年 六六八年		分其地爲九都督府罕三 州百縣設安東都護府	
奉天之東									

這些被征服的民族，財寶人口一任強大的唐朝搶掠遷徙，而其部落又完全入了中國的版籍，名義上雖然成了唐朝的領域，實際上只是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關係。這些受唐朝壓迫的民族因為生產工具沒有唐朝高妙，因為物質基礎沒有唐朝的雄厚，所以只有暫時屈服於唐朝的高壓勢力之下。唐朝的政府也很深知這些比中國落後的民族難以歸於「王化」，為要維持他的用很大代價得來的廣大領域，那種被史臣所認為遺憾的「藩鎮跋扈」的尾大不掉之軍事組織在當時是異常之需要。我們看唐代著名的六都護之設置，為的是鎮壓什麼地方呢？

名 稱 治 所 今 地 管轄區域

安東都護 平壤 朝鮮平壤 朝鮮以東

安南都護 交州 安南河內 交趾以南

安西都護 龜茲 新疆庫車 西域諸國

北庭都護 庭州 新疆迪化 天山以北

安北都護 金山 科布多境 大漠以北

單于都護 雲中 綏遠歸綏 大漠以南

唐朝費了很大的代價勞師動衆遠征那些落後民族，並於征服後屯駐重兵鎮守，其原因絕不是那些昏聩糊塗的歷史家所謂『好大喜功』『武功極盛』，而是因為當時唐朝的生產技術已經比那些落後民族高妙數十百倍。唐朝的商品已經支配了那些落後民族的日常生活，商業關係的密切使那些落後民族變成了唐朝的消費市場。唐朝用軍事力量征服與鎮攝四邊各弱小民族，主要的是因為擴展與維持當時龐大的商業市場。如果有人不同意此種分析時，且看唐朝的天子及那些落後民族的君長敘述征服與戰爭的目的究竟是爲的什麼？

『安者一曰布裕，又曰捕喝，元魏謂極密者……治阿溫密城，卽康居小君長屬王故地，大城四十，小堡千餘……武德時遣使入朝，貞觀初獻方物，太宗厚慰其使曰：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諸胡大說……』（新唐書西域傳）

再看玄宗時代，中國與吐蕃（西藏）戰爭所得到的結果又是什麼樣的性質？

「能擒其王者授大將軍，於是士益奮，吐蕃乃求和……且獻怪寶。上禮其使，

遣御史大夫崔琳報聘。」吐蕃又請交馬於赤嶺，互市於甘松嶺。宰相裴光庭

曰，甘松中國阻，不如許赤嶺，乃聽以赤嶺爲界，表以大碑，刻約其上……」（新

唐書吐蕃傳）

到了憲宗時，中國又請求以隴州塞西互市，詔書允之。宣宗時中國與吐蕃連年戰

爭，關係異常惡劣，可是當時皇帝的詔書中居然還說：

「商賈往來於邊者，關鎮毋苛留……」

由這些事實中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第一，唐朝與四邊的弱小民族之商業關係異常密切，且由商業資本對外發展過程中唐朝取得了支配地位；第二，中國與四邊弱小民族的戰爭完全爲的是擴展與維持商業市場，且因地理上聯帶的關係，例如唐朝爲要保持到康居安者等國的商品運輸，便不得不先降服當時居於交通要道的西突厥。故

隨着商業發展的程度，使唐朝的領域比之隋代尤爲廣闊。

(二) 唐朝除了用野蠻的軍事手段征服四邊弱小民族開闢國內市場外，並且由唐代開始開創了頗具規模比較開明的國際通商關係。關於此事，王桐齡的中國史也

有一節說：

『其時西方諸國商人來貿易於河西諸郡者，凡四十餘國，其中以猶太人爲最多。中國商人之往西域印度波斯等地者亦不少。海路互市則有提舉市舶官掌之，以徵其關稅。南自南洋羣島，西經錫蘭島以入於波斯灣，或沿阿剌伯半島海岸以至紅海，皆爲中國商人所經之航路。其來中國者，則以大食國人爲最盛。武后時在廣州泉州杭州諸海港經商者數以數萬計。其貿易之品，由唐輸出者以茶爲最著……』

王桐齡這幾句話對於唐朝國際貿易的描寫，可以說簡單而又扼要。在這裏我們還須注意唐朝關於國際通商中的幾個特殊而又重要的現象：

第一，據資治通鑑唐紀所載，謂高祖武德二年，葱嶺以東諸國皆朝貢於唐。又據唐會要所載，謂太宗貞觀三年，遠方諸國朝貢於唐者愈多，中書侍郎顏師古本周代作王會篇之故事，建議繪此等萬國朝貢使者之千狀萬態之服裝，以作王會圖，傳之後世，詔書允之。又次年太宗滅東突厥，塞外諸種族上太宗以『天可汗』之尊號。由這些記載中，我們可以知道那些被指為『萬國』『諸種族』者，絕不止唐朝征服與招降的環繞中國四邊的民族，而是指示出當時唐朝又開始與距離中國更加遼遠的民族發生了國際關係。中國史裏說西方商人來中國者以猶太人為最多，是不錯的。考之舊唐書唐會要資治通鑑文獻通考等書中的紀載，更可知波斯大食（阿剌伯）拂菻（東羅馬）甘棠（裏海之南）至唐朝益加繁盛的與中國確立了通商關係（如蕃客居留地的建立與市舶司官制的創設等等）。就是日本也是由唐代始比較隋朝更加密切的信使往來。所有上述的國際邦交，都是隨着當時的通商關係而造成的。

第二，唐朝基於物質的需要除了開闢幾條到日本及印度的水陸道路外，最特殊最

偉大的國際事業便是擴展了由中國出發經過南洋羣島錫蘭島以入於波斯灣或沿阿剌伯半島以至紅海的航綫。這一條航綫的開闢，使中國與南洋羣島印度阿剌伯波斯等國的商業交易更加發展與密切。（註）關於此事，日本桑原鷺藏唐宋元時代中西通

商史說：

『自西曆八世紀之初，迄於十五世紀末歐人來航東洋時為止，前後八百年間，爲阿剌伯人在世界通商貿易舞臺上最活躍之時代。且自西曆八世紀後半期阿拔斯王朝奠都巴格達以來，彼等對於從海上與印度及中國方面之通商事業，尤注力焉。』

『阿剌伯人由波斯灣，經印度洋，繞馬來羣島，至今日所謂廣東地方來經營通商者甚衆。當時阿剌伯人呼廣東曰「坎富」。「坎富」者，廣府之音譯也。蓋今日之廣東，在唐時或稱爲廣州，或稱爲廣府，自舊唐書唐六典起，凡當時之公私記錄中，皆常見廣府之名稱焉。』

(註)中國在唐代以前之海上通商，雖已略露端倪。(如前漢書地理志及梁書海南諸

國傳所載漢武帝與吳孫權遣使下海事；佛國記所載東晉時往來中印間之商人大舶，以

及高柔胸吉所說後漢商船駛至錫蘭島之事實。)然其事蹟，皆甚模糊，且其規範比之

唐代，尤屬小巫見大巫。事實上在唐代以前中國與西方諸國商業交通仍然以西北為主

體，蕃舶的運送自是微乎其微。所以我們以為唐代與國際海上貿易不啻創一紀元，竊

諸下列事蹟，實非過譽：

漢威令行於西北，故西北呼中國爲漢。唐威令行於東南，故蠻夷呼中國爲唐。」

(見宋朱彥澤洲可談)

又如明史外國傳真臘篇說：

「唐人者，諸蕃呼華人之稱也。凡海外諸國盡然。」

唐代國際貿易中心之所以由西北河西諸郡轉移至東南沿海口岸，其原因主要爲中國商品生產發展之所致。蓋中國手工業生產品到唐代已經進入了一個很發達的

階段，尤其是茶葉的大規模製造與向外輸出，使其成了近東各國人日常生活必需品之一。但是茶葉出產於中國之南方，如果中國商人把茶葉如同以往販賣珠寶珍玩絲綢綾絹般的經過天山南北路，然後再消售於西方諸國，不單運輸技術上感受極大的困難，就是數量上亦殊難滿足國外市場之慾望。在需要與供給兩方逼迫之下，那些唯利是圖的中國的及阿剌伯的商人便本其金錢萬能的魔力開闢了那一條海上航綫。由於航綫的開通，使中國的運輸工具隨着起了一番很大的改革。由中國往來南洋的木船，在東晉時據法顯的佛國記說：

『……即載商人大船，上可有二百餘人，後係一小船，海行艱險，以備大船毀壞。……大海濶漫無邊，不識東西，唯望日月星宿而進……停此國五月日，復隨他商人大船，上亦二百許人……』

至唐代南洋貿易之商船，便有了很大的進步。唐朝玄應所著之一切經音義說：『舶大者長二十丈，載六七百人』（錄自桑原所引）

再如唐朝李肇著唐國史補對於當時沿海船舶的形狀亦描寫爲：

『南海舶，外國船也……師子國舶最大，梯而上下數丈。』（同上）

當時海上帆船的製造雖已發達，但因手工業技術的關係，船質的優良自然中國船要居於首席地位。所以桑原隲藏의 結論是：

『要之，大食海舶，雖然輕快，但較之中國海舶，則不免構造脆弱，形體畸小，抵抗風濤之力不强也。據西曆十世紀中葉馬庫狄氏著書（Ketad al adjab）中所記，謂當時來航波斯灣之中國海舶，可載四五百人，且備有武器及用作燒燬海賊船之石腦油等物云云。』

中國海舶既然質堅而形廣，一般商人自然只有舍劣而就優，其影響所及，那些『構造脆弱形質畸小』的外國船只有退避三舍。所以桑原隲藏又說：

『唐宋時代外國商人，便乘往來波斯印度南洋方面之中國貿易船者，爲數不少。』

海上航綫開闢，運輸工具進步，必然要促進唐代與外國之海上交易。在代宗大曆

時代（西曆七六六—七九年）外國商船至中國東南通商口岸上使日漸增多。舊唐

書李勉傳說：

（李勉）……四年（大曆）除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番禺賊帥馮

崇道桂州叛將朱濟時等阻洞為亂，前後累歲，陷沒十餘州。勉至，遣將李觀與

容州刺史王翊併力招討，悉斬之。五嶺平前後，西域舶泛海至者，歲纔四五，勉

性廉潔，舶來都不檢閱，故末年至者四千餘。」

當然上述情形還是唐代中葉的事。從這一節材料中可以看出唐代中葉的對外

貿易及沿海商埠繁盛比之唐初是不斷的進步的。其實中國與外國海上通商自唐初

已逐漸發達，王桐齡中國史謂武后時西方人來廣州泉州杭州諸海港經商者，數以數萬

計。桑原鷗藏也說：

「除廣州外，尚有嶺南之交州（即今之安南），江南之揚州，福建之泉州，自唐